

张学良与杨常事件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K2502
3739

吉林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沈阳市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责任编辑：王伟 富伟

封面设计：高贵山

封面题字：刘鸣九

辽宁文史资料

Liaoning Wenshi Ziliao

第十五辑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公安厅印刷分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5¹/₂

印数：1—4,000 插页：4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205

定价：1.05元

前 言

杨宇霆、常荫槐是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的要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八时左右，张学良下令枪杀了杨常二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这一事件长期以来被世人所关注，且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为了弄清“杨常事件”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评价“杨常事件”，我们特编辑了本专辑，奉献给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

本辑所编入的资料不少是比较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也有回忆文章，虽属亲身经历，由于个人活动范围的局限，加上事隔多年，可能有记忆不准确之处，我们都尽力做了校订和鉴别。不过，对当时形成的资料，为保持其原貌，有些不同观点和不妥之处，我们均未加改动，凡此，请读者注意。

本书是由辽宁、吉林省和沈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共同编辑的。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和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提供部分稿件；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陈崇桥同志对本书进行了审阅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对本书编辑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

目 录

杨常事件评述·····	陈崇桥 (1)
杨宇霆·····	潘喜廷 (6)
杨宇霆别传·····	金毓麒 (17)
常荫槐·····	田 庸 (23)
杨宇霆简介·····	法库县政协 (33)
杨宇霆办实业·····	舒耀钧 (36)
杨宇霆轶事·····	荆有岩 (38)
常荫槐与吉会铁路签约经过·····	赵东凡 (45)
常荫槐拒不签约·····	顾维钧 (48)
略述张作霖时期的杨常·····	刘德权 (51)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关系·····	陶菊隐 (57)
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 (一) ·····	刘鸣九 (59)
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 (二) ·····	刘鸣九 (66)
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	高纪毅 (78)
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	王家楨 (87)
枪杀杨常的动机和经过·····	卢广绩 (100)
我很快就知道了杨常事件·····	郭鸿志 (106)
记杨常事件·····	何柱国 (107)
张学良戒备杨宇霆·····	阎宝海 (113)
记张学良杀杨宇霆始末·····	张 鉴 (114)
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丁中江 (120)
记杨宇霆·····	筱 园 (125)
张学良指派专人清理杨家财产·····	阎宝海 (139)

张学良一月十三日致杨宇霆夫人函	(140)
张学良优恤杨常家属每人给治丧费一万圆并派潘葆 刘沈帮办丧事	(141)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	(142)
王永江口中之杨宇霆	(143)
杨宇霆下葬见闻	毛伯丰 (145)
杨宇霆坟墓简介	法库县政协 (146)
杨宇霆碑铭	法库县政协 (147)
常母之碑调查	(149)
常荫槐简历	(152)

附件:

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布告	(153)
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	(155)
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	(157)
张学良电京某要人	(158)
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	(159)
杨常伏法之判决书	(161)
民报评论杨常事件	(163)
孙传芳与记者的谈话	(164)
杨宇霆被暗杀的真相	[日] 森岛守人 (166)

杨常事件评述

陈 崇 桥

杨宇霆原系清朝附生（秀才），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成归国后，历充奉军参谋长、总参议、兵工厂督办、江苏省督办等职。杨“学通今古，识洞中外”，

（杨宇霆碑铭）精力充沛，敢于负责，精明干练，才略过人，素有智囊之称。“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王家桢：《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特别是对日交涉，这是当时最感棘手的问题，而杨宇霆力任艰巨，或运筹帷幄，或折冲于樽俎之间。每当日本向张作霖提出某种要求时，张作霖辄以“好，好！我叫杨某来办”话答；如欲索书面承诺，则托词不通文墨而拒绝。只要不立笔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之打消、变质或将损害减至最低程度。在东北路权交涉时，日本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但日本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唯恐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使日本已取得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苏联学者也认为张作霖之所以未与日本签订正式协定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日本深感杨宇霆这个人“不易对付”。

常荫槐，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历任奉天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代部长、沈海路督办、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职。常和杨一样，果断明快，干练多才，办事雷厉风行，敢做敢当。常荫槐对东北铁路的建设和维护路权等问题上，是有功的。日本对中国自己兴建“打通铁路”（打虎山——通辽），“屡次提出

严重抗议”，说什么它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侵犯了日本在华的所谓权益，等等。修建打通铁路，常荫槐实主其事，但他不怕威胁恫吓，将打通铁路迅速建成。一九二七年张作霖任北京军阀政府大元帅，潘复组阁任总理。当时日本曾逼迫张作霖签订新五路条约，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休想出关。时常荫槐任交通部代部长，首当其冲，但常坚决主张拒不签字。当常了解到张作霖有“应允”签字之意，他立即表示“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宁可牺牲代理部长职位也不能答应什么条件”。

事实表明，杨宇霆、常荫槐和张学良一样，“他们都是反日的”。

杨宇霆和常荫槐虽都有才华，但他们一向专横跋扈，独断专行，恃才傲物，盛气凌人。杨宇霆长期在张作霖身边充当总参议，位同首辅，炙手可热。他多次怂恿张作霖进兵关内，穷兵黩武，致使军费开支浩大，入不抵出，奉票日益毛荒，几至不可收拾。中国人民大受其害。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位，杨常二人视张学良如同“阿斗”，根本未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他们每有什么请示和要求，动辄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他们对张学良的命令经常拒不接受。因张学良染有嗜好，每次开会都不能终坐。在会议期间，张离开时均由杨宇霆主持，每当张打完针下楼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时，杨辄加以制止，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杨也经常背后对人说：“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学良的乳名叫小六子，后来张学良任总司令，杨常见张学良仍用轻薄口吻，以“六爷”或“司令官儿”称之。杨常二人的关系特别密切，而且遇事此呼彼应，沆瀣一气。他们俨然以“太上总司令”自居，对张学良的诸多行政措施，公然干涉。对此，张学良十分不满。特别是杨宇霆为其父做寿时，张学良偕原配夫人于凤至驱车前往拜寿，未得杨宇霆的格外礼遇，人们对少帅的到来也不以为意。相反，当

杨宇霆进入客厅时，在座者均肃然起立。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也对杨恭维备至。目睹这般情形，张学良深感十分难堪。

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做他的北方同盟者，用以对付冯玉祥和桂系，他把所谓白崇禧策动杨宇霆反对张学良的未经核实的信息用加急电报告知张学良，并居心叵测地劝张先下手为强。对此，张学良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在此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也竭力挑拨离间张学良与杨常的关系。早在张作霖遇炸时，日本就散布谣言说：在奉天的爆炸是杨宇霆为了推翻张学良干的，试图在奉系中制造分裂。据日方材料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大川周明，曾把日本赖山阳写的《日本外史》赠送给张学良。并用红笔把丰臣秀赖被权臣德川家康推翻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暗示杨宇霆即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赖。大川周明虽与张学良相识，但他这样做绝不是对张有所厚爱，而是蓄意制造矛盾。希张学良与杨常之间发生火并，日本好乘机渔利。

这时，奉系内部一些对杨常不满者，也竭力挑拨张学良与杨常的关系。如说“杨常已订一月十二日在沈阳发动叛变，杀死张学良”。因而“吁请学良迅速逮捕杨常处死。”并说“不除此二人，必为大患，悔将无及”。其实这些都属于无中生有的谣言。

由于杨常傲慢无礼，张学良早已有杀杨常之心，后又听到上述事关“张家存亡攸关”的诸情况，张学良便下了杀杨常的最后决心。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下午五时半，杨宇霆、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并从兜中取出已经拟好的便条，要求张学良签字批准。张故意推拖说，待饭后再作决定。杨常于八时左右再次到大帅府，张学良便下令将杨常枪杀于老虎厅座席上。据一位亲身经历者说：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性质“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

（刘鸣九：《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周恩来选集》一书第378页附注说：“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故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枪杀了杨常”，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杨常被杀后，所公布的判决书等都是事后炮制的，其中多是不实之词。杨常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处处给张学良以难堪，确有致死之由，但揆诸事实尚无应杀之罪。杨常被杀后，张学良也感到内疚，有懊悔的表示，但已无可补救了，最后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我们好好地干，否则对不起邻葛、瀚襄于地下了”。当张学良同他的外国顾问端纳乘车来往经过杨宇霆的家门时，张一再说：“可怜的杨啊！”对杨宇霆表示了惋惜之情。（《张老师与张少帅》198页）。

杨常被杀的影响，大体上有两种反映，一是认为杨常在政治上野心太大，不把他们杀了，张学良就无法保全其在东北的统治地位，正因为杀了杨常，张学良的威望才大大提高，自此以后，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无人敢不尊重“少帅”了。另外也有为张学良惋惜者，认为杀杨常是“自毁长城”。“少帅这件事做得太轻率，太鲁莽了”。（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有人认为“老将”尸骨未寒，遽杀老臣，致使“老将”时代的人物，兔死狐悲，人人自危，不敢多说话，不敢多负责了。后来对张学良考虑不周，遗误之处，都不敢直言相谏由于杨宇霆被杀，致使东北对外交涉竟无折冲之人可恃。常荫槐被杀也使东北交通管理事业失去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两方面的情况确实都是实情，但当时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分析这类事情，当然不能忽视张学良的个人意志性格，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民主基础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当时张学良与杨常之间的矛盾，确实很尖锐，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问题是怎样解决！如果中国当时是个法制健

全的民主国家，通过正常民主程序，按法律办事，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问题本不难妥善解决，绝不至于非杀头不可。可惜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和法制可言。

就张学良本人来说，他自幼即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因而其思想作风和奉行的政策，与其父有明显的区别，表明他是进步的，但他的进步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当时他只不过是“从封建军阀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人物”。

（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辽宁文史资料，第八辑）张虽仰慕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感兴趣。

就社会传统观念来说，当时中国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封建君主世袭制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张作霖名义上虽不是封建皇帝，但从其生前的步步安排，全是为其儿子着想，准备由张家父子传下去。东北的军政官员长期处于封建封闭状态，从未受过民主革命的洗礼，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绝大多数人认为父死子继，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东北的天下，就是张氏父子的天下，谁反对张学良，谁就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

因为当时中国不具备按法律程序和“和平”“民主”解决的条件，所以张学良断然采取了中世纪争夺政权喋血功臣之间的老办法，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枪杀了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之死，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所吞噬。事实表明，只有在改变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健全法治，以法治国，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重演。如若说从杨常事件中应汲取历史教训，这就是最根本的历史教训。

杨 宇 霆

潘 喜 廷

(一)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有自况之意，因而在政界中有小诸葛之称。他原籍河北省滦县戴家岭人。其祖父杨正荣在清同治年间逃荒至法库县蛇山沟村，遂以此为籍。杨正荣生有四子，其季为永昌，系杨宇霆之父，因性情古怪，处事奸巧，故乡人称为“杨二绞杆”。杨家当初贫寒，杨宇霆父亲三十岁时才与铁岭孤树子村一位张姓女子结婚，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生杨宇霆。

杨宇霆少年时很聪颖，大约十岁入本村一家私塾馆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的启蒙书。由于他记忆过人，对这几本书很快就能背诵和理解，塾师教他感到吃力，于是推荐他到铁岭县张家窝堡秀才张三元书馆读书。一九〇四年清廷虽颁布停止科考，但因盛京（辽宁）是其“发祥之地”，特许再举行一次科举，杨宇霆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心参加考试。然而杨家是逃荒户，没有籍贯，按清朝规定是不能参加科考的，所以现向邻村高力屯杨姓认了本家，因这家杨姓是复县人，所以杨宇霆只好以复县考生名义报考。这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辽南考场设在锦州，但辽阳、海城、盖平等县富家子弟，因道路不靖，不敢前去应试，所以参加者寥寥无几。杨宇霆不远千里赴锦州应试，在考试中文文章作的很好，遂考中了清代末科秀才，当时年仅十九岁。

杨宇霆考取秀才，经人介绍到本村“联庄会”当上了“文案”，有一次他随队剿匪，由于年轻鲁莽，一进院就开枪，险些误伤好人。对此事他感到悔恨，过后不久就不干了。一九〇八年奉天两级师范和中学堂两校招生，杨宇霆考入中学堂为插班生。入学第二年，一九〇九年六月正赶上清政府选送一批学生去日本陆军士官军校学习，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决定由中学堂选送几名。当时主要是测验外语，杨在考外语时，当场把外语课本《华英初阶》一书从头至尾背诵一遍，考员惊异，遂被录取。出国前赵尔巽接见了他们，当时杨宇霆代表全体留学生，作了答谢词。赵尔巽当时对他仪表和激动的答谢词表示满意，为他回国后得到重视打下基础。

杨宇霆到东京后，入日本士官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每期考试都名列前茅。一九一一年五月毕业回国，正赶上锡良卸任，赵尔巽第二次来奉天任东三省总督，他想起三年前资送留日学生之事，因此又接见了杨宇霆等人。接见后，杨宇霆被分配去宽城子（今长春）驻军第三镇孟恩远部任见习排长。民国建立后，第二十三镇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三师，他升任营长。一九一三年杨宇霆调东三省都督府任军械科长兼军械厂厂长。当时有一卫队连，他仿照日本军制办法训练，有一次在街上行走被张作霖看见，见其军容整齐，疑是日本军队。后有人告知这是军械厂的卫队连，是杨宇霆训练出来的，张作霖当时大加赞赏。一九一六年四月张作霖撵走段芝贵后，张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延请各方面人士，于是把杨宇霆调到二十七师任参谋处长。从此，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开始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为其出谋划策，首先是改造二十七师，扩大军队。

奉军二十七师，是一九一二年，由张作霖所率领的中前两路巡防营改编的。这支队伍基础是张作霖早年办的“保险队”，所以无有训练，不仅纪律散漫，而且也无战斗力，但经过杨宇霆的训练，确实军容为之一新。对杨宇霆整顿二十七师，早有

公论。在他被张学良枪毙后，于冲汉送了一幅挽联：“棘门霸上如儿戏，我识将军未遇时”。挽联意思是说，张作霖在未遇杨宇霆的时候，他的军队犹如棘门霸上的儿童嬉戏，但自从遇到杨宇霆，奉军好象汉朝周亚夫的细柳营军容一样。挽联虽有些过誉，但杨宇霆帮助张作霖改造和训练军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

杨宇霆辅佐张作霖后，就不安于东北，主张向关内发展势力，利用他与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日本士官同学的关系，代表张作霖参加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十二月两次“督军团”的会议，为奉军发展和向外扩张铺设了道路。由于杨宇霆与徐树铮关系密切，在“府院之争”中奉系支持皖系段祺瑞，所以段辞去总理职务后，把他在任职期间与日本订购的军械，送给了张作霖，以此换取其支持。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宇霆携带徐树铮送给的领取军械证件，率军械厂厂长丁超和奉军第五十三旅张景惠部开到秦皇岛，把日本运到的步枪二万七千余支和子弹及其他军械，全部劫走，当即用此军械编成七个混成旅。

张作霖意外得到这些装备，完全是杨宇霆的力量，对奉军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奉军才能向外扩张，问鼎中原。扩编军队后，为了支持段祺瑞，对抗广州护法军政府，于三月十二日，组织援湘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张作霖亲率奉天暂编第一师张景惠部、二十七师孙烈臣部，入关进驻军粮城。奉军南下，声势很大，不久直军吴佩孚班师停战，援湘之军停止前进，奉军暂编第一师张景惠部进驻北京南苑。是年秋，徐树铮与杨宇霆企图发展势力，合谋利用奉军之名，冒领陆军部拨给军款三百七十万元，招募新兵四旅，以奉籍日本士官军校毕业生丁超、于珍和皖系军官宋子杨、褚其祥为旅长，在洛阳和信阳两地训

练，此事被张景惠密报张作霖。张作霖极为震怒，立即下令免去徐树铮副司令的职务，又扬言到天津找其算帐。同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于九月二十七日把杨宇霆看押起来，后经段祺瑞说情，只将其参谋长撤职了事，丁超、于珍等人也被免职。至此，杨宇霆不敢回东北，遂滞留京津等地，终日无所事事，除了与留日同学任陆军部参事的韩麟春和任科长的王树常相往来外，与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人也颇有交往。

张作霖罢免杨宇霆之后，提张作相为参谋长。张作相为人宽厚，但不谙军事，缺乏办事能力，多不称张作霖之意。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后，张作霖对曹锟不满，打算对直系发动战争，但又感到奉军中沒有能出谋划策的人，于是让陈兴亚发电召还杨宇霆回奉。十二月杨宇霆回奉，第二天即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参加计议攻打曹锟、吴佩孚的军事会议。杨宇霆向张作霖献策说：“我们出师必须有名，最好办法是我们向中央推荐一位任总理的人。事成则以拥护中央，维护法统为借口，大兴问罪之师”。当时奉系在北京无有可资拥护的人，而杨宇霆在居京时曾与梁士诒、叶恭绰有过往来，因此他向张作霖建议，保荐梁士诒为总理。于是张作霖向北京政府推荐梁士诒，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任命其为总理。

曹锟、吴佩孚闻讯后立即联络江苏、湖北、山东、江西、河南、陕西六省督军，通电反对。攻击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卖国媚外，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反对他当国务院总理。曹锟、吴佩孚上了圈套后，张作霖也不示弱当即发表通电，略谓：“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梁内閣甫经宣布，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乎？国事何望？应请主

持正论，宣布国人”。并要吴佩孚宣布梁士诒“卖国媚外的真相”，由此愈演愈烈，在“电战”之后，直奉双方都暗中积极作战争的准备。一九二二年三月末，张作霖以保卫京畿为名，派杨宇霆率十二万余人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以及津浦线的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大本营设在军粮城，张作霖为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奉军作战计划，兵分两路直攻吴佩孚直军大本营保定，但于四月二十九日战争爆发后，西路军司令张景惠和旅长邹芬被直系收买，表示厌战，率军离开战场退回南苑。因此影响了东路奉军的战斗情绪，不战自退，张作霖率军由喜峰口退出山海关外，集结在兴城、绥中一带。张学良、郭松龄部由宝坻、卢龙直退榆关据守。这次战争就是第一次直奉战，时间很短，从四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五月五日，共七天，以奉军失败而结束。

奉军失败退出关外，但损失不大。北京政府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于五月十日下令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杨宇霆策动东三省议会，于六月三日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独立”，与中央断绝一切关系，至此，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张作霖在杨宇霆积极建议下，决心“整军经武”改革旧军，特成立“陆军整理处”，充实东三省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编练新军。经过一年整训后，共编成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团，约有三十五万余人。并建立东北海军司令部和航空处，扩建兵工厂等。

奉军经过一番整顿后，实力有很大提高。在整顿训练时，杨宇霆先后把同学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等人援引过来，逐渐形成日本士官派；而郭松龄就机倚仗张学良的关系，也拉拢不少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另树一帜，因而在奉军中造成两派势力。杨宇霆与郭松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发生郭松龄反奉和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其原因无不与此有关。

奉军战斗力量加强后，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张作霖就江浙战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皖系卢永祥，声讨直系，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杨宇霆仍然担任“讨直军”参谋长，指挥二十余万奉军，向直军进攻，双方战事异常激烈，战争历时五十余日，不分胜负。这时杨宇霆又运用政治手腕，发挥联络孙中山、段祺瑞建立“三角同盟”的作用，大造声势，共同攻击直系。此外，还通过热河骑兵旅长鄂斌英，以巨款收买了冯玉祥。冯玉祥于十一月二日倒戈回北京把曹錕拘禁起来，使吴佩孚一败涂地。奉军胜利，抢了许多地盘，论功行赏，任命阚朝玺为热河都统，李景林为直隶督军，张宗昌为山东督军，姜登选为江苏督办，郭松龄为安徽督办。但不知何故张作霖忽然改变，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省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省督办。这样一变，激怒了郭松龄，他热中抢一个地盘，并早派其参谋长彭振国到安徽办理接任手续，不料忽然变化，他认为杨宇霆从中作梗，由此对其更加仇恨。杨宇霆是个空手督办，走马上任没有一兵一卒，原来奉军丁喜春、邢士廉两师驻南京和上海，刘伟一旅驻浦口，这时也被郭松龄下令撤走，拆了杨的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浙江军阀陈调元发动武装夺权，而杨宇霆毫无办法，狼狈逃出。

(三)

杨宇霆失去地盘逃回奉天，张作霖并未斥责，仍令他为总参议，这时郭松龄对杨宇霆新仇旧恨交集在一起，郭松龄在其政治野心支配下，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滦州发表反奉通电，班师出关东下，假借“清君侧”问罪杨宇霆而发难。郭松龄出关后以东北国民军司令部名义张贴布告，攻击杨宇霆，“查近年军事频仍，生灵涂炭，全由杨宇霆一人所鼓惑。南侵江浙，北图苏皖。近欲称兵都门，扰乱畿辅”。

郭松龄通电和布告，指名问罪杨宇霆，在这种情况下他怕

张作霖效法汉景帝杀晁错以谢溧王清君侧之故事，乃声明辞职，逃避大连隐居。但郭松龄反奉是在日本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部小矶国昭、驹井德三等人支持进行的。其目的是推翻张作霖政权，取而代之，非在杨宇霆一人身上。因此，张作霖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派张学良转赴大连，要杨宇霆回奉天，组织“讨逆军”对抗郭松龄。杨宇霆回奉天后一方面把兵工厂所有枪炮拿出，组织一个旅，让张学良率领西去阻击郭松龄反奉军；另一方面他去旅顺与日本关东军联系，要求不要援助郭松龄。十二月八日，日本发表所谓“中立”声明，不准郭松龄军队“越过南满铁路线”，张作霖争得了缓兵的机会，迅速把吉黑和各地军队调来。十二月二十三日，巨流河一战，郭松龄一败涂地，携妻韩淑秀逃跑，被穆春师王永清旅所捕获，二十四日在辽中县老达房子屯被枪杀。郭松龄反奉战争，仅一个月的时间以失败而告终。郭松龄反奉失败的原因很多，但由于杨宇霆给张作霖出谋划策，求助日本“中立”和组织“讨逆军”等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有人说郭松龄反奉失败，是败在杨宇霆手里，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郭松龄夫妇被处死，却结下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对杨宇霆的仇恨。所以在张学良执政时，郭松龄一些亲信都诽谤杨宇霆，不仅纵恿张学良夺掉他的军权，最后把他杀掉，达到发泄为郭松龄报仇的私愤。

杨宇霆为人虽有智谋，但刚愎自用，除张作霖以外，目空一切，居功自恃，平定郭松龄反奉后，没有自省精神。反而又随张作霖率军入关，击败冯玉祥，夺取北京政权，组织安国军总司令部，一九二七年六月又成立安国军政府，许多人都得到一定位置，而 he 自己在阁员、部长中却无一席。一九二八年春，第三、四方面军对国民党军作战不利，韩麟春辞职，杨宇霆在张作霖面前说了大话，遂被任命军团长。杨宇霆虽有运筹帷幄之能，而无实际作战经验，但他以总参议身份屈就一个军团